

学人生命的价值与使命 ——朱绍文先生的治学与育人

杨春学

一、研读经典原著，是在“与伟人对话”！

所谓“经典”，虽为某一时期的某一学者所著，但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体现着那个特定时代的群体智慧的结晶。以古人的经典语言来说，那必定是“继往开来”之作。所以，研究经典著作，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思想史专业的必修课。但是，把研读经典原著，视为是在“与伟人对话”、与伟大的“思想家对话”，却是朱绍文先生对经典的最独特的精辟理解。

这是朱先生治学经历的结晶之言。他的这种体悟源于留学日本的经历。他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之前，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当时的一高是以一种非常之心态对待世界经典——“世界主义”，不分“东学”或“西学”。一高文科的各门课程几乎都是以经典原著为核心来组织教学的。例如，文学必定从莎士比亚、席勒、歌德的原著开始，哲学以黑格尔、康德等的原著为核心。日文，作为“国语”，读的是《源氏物语》、《竹取物语》等古典文学。授课教师随时会让某一位学生站起来，解说原著中的某一段话。

这样的教学内容与训练，自然使学生不敢偷懒，只得拼命读原著。对此情此景，先生曾回忆说：“日本一高生说，这是愉快的三年。而对我来说，苦死了。三年间，几乎天天晚上查字典，星期天也不出去玩，顶多星期六下午去看电影。我学的哲学、伦理学，是属于西方体系，同我的观念没有一点抵触。我在上海读中学时代一点也没有学过，只学过似是而非的三民主义。日本人是从学问上学，并不是灌输人生观”。

重视经典原著的教学方式，不仅限于一高。东京帝国大学更是如此。除斯密的《国富论》等英国古典经济学著作外，主要是德国经济学的原著。正是这一经历，奠定了先生的治学之道。

对于日本学界的“广求知识于世界”的态度，先生把它注解为“世界主义”，解析说：“他们历来不把斯密、黑格尔等等的社会科学经典作为与东方不同的‘西方的’东西来研究，而是把它们都作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来学习和吸取的，是抱着要吸收所有人类知识成就的态度来学习的。从来就没有中国那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想法。你不把黑格尔的学问当作自己的学问怎么行？日本人就是想要把人类的精华完全变成自己的东西，并不认为是外人的。所以，学起来，就快得多，而且也很地道。”

国人对社会科学经典原著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虽然表面上承认“西学”可共“采补”，但其骨子里的精神却是“中学包罗西学，不可让西学凌驾于中学之上”。“中学”承载着高级的“道”，“西学”至多有“器”的价值。持这类观点的人派生出来的理由五花八门，最时髦的理由，在上世纪80年代是西学的“资产阶级性质”，现在是中国特殊的“国情”，抬出以“批判的态度”来做取舍的标准。

这种学法听起来实在诱人！可惜，它对文化移植的本质（civilization is syphilization）缺乏真正的理解，总想任意剪裁，择肥而食，实际上是想投机取巧。结果，我们只学到一些似是而非的皮毛。我们从来没有学到西学的“精

神文明”，诸如科学精神、理性、自由、民主、人权等等，根本就不知道真的西学是什么！风流所及，真正的西学还没有“进口”，就被我们“止”住了。一旦有人真正谈点西学时，就会有人要向“政府质询”！

作为朱先生的学生，我们深受他对待经典原著的“世界主义”思维的影响，深受他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的批判的影响。也许，学习西学的结果，会带来不可避免的一些“流弊”，可是，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大目标”，那就是建设现代化的强国。在这个大目标下，我们应该有“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决绝和胸襟，向日本和土耳其学习。日本从明治维新时期就提出“脱亚入欧”的口号，土耳其凯末尔政府之后也提出类似的口号，并努力实践之。他们不会要“日学为体”、“土学为体”的花枪来自我陶醉，没有工夫去挑西方列强身上的弊端，只是专心致志地行走自己的现代化之路。

这些国家“脱亚入欧”的学习结果如何呢？且不说日本，土耳其都已经成为穆斯林世界中现代化国家的典型。但它们的文化传统中有生命力的东西并没有因此消失。对此，先生评论说：“日本的东方知识没有放弃，史实摆在那里。它的儒家研究比中国还深，它的资料保存比你还好，它的生活方式保存很多中国唐代的的东西，而我们早就没有了，连埋在地下的也破坏不少。”

朱先生是以学习、吸取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促使民族奋进的态度来对待经典的，也以这样的精神和方式来培养学生。对此，在2008年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建院三十周年晚会所安排的“老师与学生的对话”访谈节目中，樊纲教授的回忆做了精彩的注解：“朱先生对我们，在一定意义上不太管。什么意义上呢，那就是让我们自由思考，他不给我们规定什么事情，他只管一点，就是让我们读书，而且要读原著，英文的原著。我跟朱先生学了六年，硕士三年，博士三年。有一次，当时社会上很热闹，改革开放嘛，我们几个同学参加了一些研讨会，回来告诉朱先生，以为朱先生会表扬我们。但他把我们臭批一通，说你们现在好不容易有这么宝贵的时间，现在读原著，是在和伟人，是在和思想家们在对话。你们要抓住这些宝贵的时间去和伟人对话，你们为什么到外面去和俗人对话？他还说，你们将来到外面做事情的时间还有的是，而你们再系统地读原著的时间就这么几年啦，所以一定要打好这个基础，将来你们才能走的更远”。

经济学家必须是理性和真理的守护神，应该超出政治上权宜之计的忠诚。只要谈及研读经典的求精之精神，先生几乎都会提及日本学者研究《资本论》手稿之事。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少数年轻的大学副教授和教授（大多是先生的同窗或同门好友的学生们），就开始奋发“破读”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第三卷的手稿，他们怀疑恩格斯版的这两卷著作有错和余漏的地方。结果，他们的解读得到德国有关专家的高度评价，被邀请参与重新编写这两卷著作。

二、“关注穷人，是经济学的良心问题”

先生强调，学习经典原著的最终目的，不应是“为学术而学术”。对这些原著的解读，既要注意它们产生的时代背景，更要立足于我们时代的主题，结合现实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只有这样，才可能做到“入宝山而不空手归”。“学”无国分，“术”有国情。求知（即“学”），要坚持“世界主义”的视野，而为国献策（即“术”）却必须是“国民经济主义”，运用从世界主义中获得的知识，求解祖国特定时期的课题的答案。这是先生治学的核心思想。

国人对经济学的最终目标就是“经世济民”。对经济学的“济民”的具体含义，朱绍文先生的理解直截了当，那就是“中下层人民的富裕”。他不厌其烦地

强调，“关注穷人，是经济学的良心问题”。任何一个时代，上层社会的生活都是优裕的，受苦受难的都是中下层平民。

每次临听先生的这种教诲时，我都会想起经济思想史上一大批杰出的大师们的身世。马克思出身于一个高贵的家庭，恩格斯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实业家，但他们都把毕生精力贡献给解放劳苦大众的事业。对于马克思的这种行为，其父亲，一位典型的资产阶级文化的捍卫者，曾抱怨说：“神啊，帮帮我们吧！这种无法无天，麻木地不负责任地玩弄所有科学，在灰暗的油灯底下麻木地郁闷地冥想，套着学者的长袍、顶着乱七八糟的头发的野蛮人”。但是，正是这样一位在父亲眼中的不务正业者，与他的亲爱战友恩格斯一起，影响了之后的整个世界思想。

即使是像马歇尔这样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大师，也是如此。他父亲让他进剑桥学习，原本是想让他为将来当牧师或从政做准备。但是，他没有听从上帝的召唤，去讲经布道，而是听到了穷人催促他去研究经济学的呼唤：“我在假期参观了几个城市中最贫困的住处，并通过走街串巷，看到了一张张最贫穷人的脸。接下来，我决心要尽自己所能，透彻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像斯密一样，马歇尔非常关注的，不是富人，而是整个人类的进步。为了激励自己，他在19世纪70年代就花了几个先令，买了一幅小油画“一个工人的肖像”，并把它挂在学校的宿舍里。这幅画中，是一位有着满脸憔悴而又充满渴望的表情的工人。

朱绍文先生最初之所以选择经济学的研究，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但更为具体。与那个时代的中国有为青年学子一样，他所看到的，是祖国的衰弱和广大民众的贫困。内部混乱不止，且累受外国的凌辱。

先生是一位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的学者。他本人的所有研究都是紧紧围绕着祖国的“国强民富”的时代主题（现代化）展开的。现代化不仅仅表现为物质形态，更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理性与自由。因此，基于这一主题，他在经济思想史领域中的经典著作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系列方面：包括德国历史学派的李斯特系列、以英国古典经济学为主的斯密系列、以《资本论》为核心的马克思系列。他在其著作《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的序言中写道：“一个国家在走向‘近现代化’道路上，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方面，作为人类智慧结晶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弗·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三大经典，可以说是天赐的理论法宝。因为这三大经典都是不同历史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结晶，而且经历了人类历史的检验”。

“斯密系列”的经典著作之精神在于“富民”。斯密及其追随者力图寻求一种能使社会中下层的平民受惠的“普遍富裕”之路。这条道路必须以新的意识形态取代中世纪的宗教狂热、迷信和贵族特权势力。那就是启蒙运动体现的精神：对科学、理性、个人自由和经济个人主义的无限信任。“李斯特系列”的经典著作之精神在于“强国”。李斯特用敏锐的眼光关注着各种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特定时代的特征。他及后来的德国历史学派，都在寻求使本国的经济发展从英国对世界生产和贸易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思想武器。“马克思系列”的经典著作所寻求的，不仅仅是“普遍富裕”，而是人从所有的特惠和特权制度压抑中解放出来，实现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先生把主要精力用于如何借鉴日本的经验和教训方面的工作：创办“日本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出版《日本市场经济》季刊；以中心为平台开展中日学术交流；组织翻译一大批日本经济学家的著作。

三、师生关系：情同父子

先生在培养研究生时满怀爱心，不仅敦促研读经济学经典文献，更注重社会责任感和学术人格的教育。先生常常教导我们，立志于治学者，必须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丈夫的理想和抱负。只有心怀这种理想和抱负，面对时代和环境极为恶劣的处境之时，你才会有保存自己的生命意志，而面对繁荣盛世之时，也才会拥有抵抗现实世界的各种诱惑的强大精神武器。不然，很容易把做学问这一崇高的职业降格为一种谋求个人私利的“敲门砖”。

抱有这种理想的知识分子，不能以唱赞歌为研究的主要旋律，应当像凯恩斯所言，充当社会的“大夫”，致力于改革社会的缺陷。他在给《经济学茶座》所写的一篇杂文中，具体地提到凯恩斯的这一比喻。

在前面提及的那场“老师与学生的对话”谈话节目中，主持人朱军问先生：“朱老师是樊纲的先生，樊纲不用说，就是学生了。我想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在您的心里，他（指樊纲）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

朱先生回答说：“我们社会科学院的师生跟父子关系一样，这一辈子，他心里有我，我心里有他，他老挂着我，我也老关心他。我们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人，我虽然是老了，我94岁，我们是两代人，但是，我们是一代人，什么叫做一代人呢？就是为了中华民族复兴大业，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是共同的，一起奋斗的”。

我没能亲历现场，但通过电视节目，看到这一对话时，不住泪流满面。即使是在写下这段话的此时，也是如此。因为，那种师生的亲情，也是我本人经常切身体验到的，并立刻在脑海中浮现出其1994年春节前夕的一个场景。研究生院放寒假，我准备回家过年。行前，到老师家道别。老师给我600元钱，我坚辞不要。老师说了这样一句话：“你现在是穷学生，但回家总得给妻儿带点东西。你能用你父母的钱，为什么就不能用老师的钱呢？”。听毕，我含泪收下。

也许，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也必须以某种方式来表征。对此，朱先生回忆一高读书的情形时描述道：“生活中，日本学生都有一种青云之志，都以破衣破帽为荣，光头，穿制服，不穿袜子，穿木履。谁也不以为耻。这是一种活的传统文化，有一种力量，中国古代名士自身才有的那种品德”。

他也是以这样的精神来教育学生的。我跟他读博士学位之初，有一次，他通过电话说道：“来这里读博士，你就把它当作是入深山老林，当三年和尚修行，要甘于清贫和孤独”。

在朱先生看来，学生时代自然可以不以破衣烂裳为耻，以此示志，但工作之后，却必须注意衣冠的整洁。他认为，言谈举止、穿戴仪表，显示出的是一个人教养的高低、生活的品位和文化的层次，不可小视之。

我读博士学位之前，虽然是大学教师，却一直属于不修边幅之类。是先生的言传身教改变了我的这一习惯。记得，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前夕，先生一再吩咐我，必须穿上西装，打上领带。之前，我不曾穿过西装，临时买了一套。是时，先生自然也是西装革履，到答辩会场的。此后，我也就不再敢不修边幅了。

先生的“身教”，最为重要的是他那“学无止境”追求精神。他于1957年被打为“右派”，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与学界隔绝22年。即使是在那段备受凌辱的阴暗岁月，他也没有放弃学习，偷偷写下2万多字的长文《日本帝国主义九·一八之后对我国东北的经济掠夺（1931-1945）》、翻译德国罗雪尔的名著《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大纲》和日本学者林直道的《日本国际通货危机》。这些著译改革开放之后，始得以出版。

到1979年平反之时，先生已是64岁之人。但他又重新集中精神，努力追赶国

际上经济学发展的最新知识。对此，钟少华先生于1995年对他的谈访中，朱先生作了最好的诠释：“我在一高学习时养成的习惯，就是不满足于自己的学习。到现在我岁数这么大了，别人在著书立说，我还在学习，天天寻求知识，向人类学习，向现代学习，向世界学习。人生应该这样。中国本来就有这样的古训，学无止境嘛。”

把学习视为人生的本身，以知识和信念作为生命之源，这就是先生的精神，也是我们的榜样。

朱绍文简介：生于1915年，江苏省人。1934年赴日留学。1938年毕业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194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45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1946-1950年任上海沪江大学城中商学院和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西洋经济史、经济思想史教授。1950年调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任专门委员。1979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2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1984年后，历任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客座研究员、客座教授。1989年，为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2007年，被推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终身荣誉学部委员。曾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会长，全国《资本论》研究会顾问，中华日本经济研究学会副会长，祖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第一届理事，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六届、七届政协委员、常委等。主要著作有：《李斯特国民生产力理论研究》（，1943年，日文）、《关于人民币的若干理论问题》（1954）、《战后“价值转型问题”的争论》（1983）、《〈国富论〉中“经济人”的属性及其品德问题》（1986）、《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及其教训》（1992）、《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2000）。